

引用:张建伟,范玉敏,王小荣.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首图”的文化内涵[J].中  
医药导报,2025,31(12):261-266.



# 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首图”的文化内涵<sup>\*</sup>

张建伟<sup>1</sup>,范玉敏<sup>1</sup>,王小荣<sup>2,3</sup>

(1.酒泉职业技术大学,甘肃 酒泉 735000;

2.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3.敦煌医学与转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首有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通过考证本书的卷首图,发现书中的编写体例、文本形式、学术思想均围绕三皇文化所展开论述。书中大小四神、二旦汤的创立体现了伏羲文化,组方遣药原则体现了神农文化,书名、编写体例体现了黄帝文化,该书的学术思想是三皇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敦煌医学;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三皇文化;文献考证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12-0261-06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12.041

## Study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Frontispiece Illustration" in *Fuxingjue Zangfu Yongyao Fayao* from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ZHANG Jianwei<sup>1</sup>, FAN Yumin<sup>1</sup>, WANG Xiaorong<sup>2,3</sup>

(1.Jiuq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Jiuquan Gansu 735000, China;

2.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3.Key Laboratory of Dunhuang Medici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frontispiece of *Fuxingjue Zangfu Yongyao Fayao* feature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Three Sovereigns, the Four Deities, and the Twenty-Eight Lunar Mansions.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on this frontispiece,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book'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extual form, and academic thought are all elaborated around the culture of the Three Sovereigns. The creation of the major and minor Four Deities and the Erdan Decoctions (二旦汤) in the book reflects the culture of Fuxi. The principles of formula composition and medicinal selection embody the culture of Shennong, and the book's title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emonstrate the culture of the Huangdi. The academic thought presented in this work represent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the Three Sovereigns.

[Keywords] *Fuxingjue Zangfu Yongyao Fayao*; Dunhuang medicine; illustration of the Three Sovereigns, Four Deities, and Twenty-Eight Lunar Mansions; culture of the Three Sovereigns; textual research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首载于马继兴于1988年所著的《敦煌古医籍考释》(以下简称“《考释》”),书中记载《辅行诀》原藏于敦煌千佛洞,并简要说明了此书的发现过程。此后马继兴再次将《辅行诀》收录于1998年

所著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以下简称“《辑校》”)中,并将此书的发现经过、各版本收集、校勘要点、证伪过程做了较为全面的补充。张偓南花重金从道士王圆箓手中购得此书,之后张偓南嫡孙张大昌将此书世袭而藏,不幸原卷子在“文化大

\*基金项目:酒泉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重点项目(2023XJZXM05);甘肃省教育厅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2024B-345);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五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239号)

通信作者:王小荣,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诊法和辨证论治体系的理论及临床研究

革命”时期被毁。1974年初,张大昌以“赤脚医生”之名将此书的追忆本寄送至中国中医研究院,经马继兴证伪后,将此书收录入《考释》中,后渐被学者所重视。此书现存版本为张大昌追忆本和其弟子之间的传抄本<sup>[1][69-70]</sup>。马继兴对本书通过实地考察、名家专访、专家咨询及书中的方剂名称、药物名称、避讳字、古俗字、通假字等方面进行证伪,认为此书非陶弘景本人所撰,为其弟子或后人辑录其说而成,成书年代在陶弘景(456—536年)生活时代之后的南北朝梁代末期至五代间<sup>[2]</sup>。《辅行诀》卷首有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是伏羲、神农、黄帝文化的直接体现,也是本书制方的核心所在,但诸多医家对此图的深意并未作出较为合理的解读。现笔者试以卷首图的三皇为主线,从本书的书名、主体思想、编排体例、药物性味等方面阐述《辅行诀》中的学术和文化价值,为研究经方学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 1 《辅行诀》卷首图概述

目前《辅行诀》各类版本中所见的卷首图主要有以下3种:第一种为王雪苔考证的“依张大昌草图摹绘之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sup>[3]</sup>(见图1),第二种为王子旭提供,王秉灿画师手绘的“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sup>[4][5]</sup>(见图2),第三种为陈志欣提供的“人面蛇身四神二十八星宿图”<sup>[5]</sup>(见图3)。图1和图2虽绘制的形状不同,但图中所体现的内容是一致的,图3则与其差别较大,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图1和图2的中央绘制的是三皇,而图3是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孰是孰非不好下定论,陈志欣对图3来源未作说明,但衣之镖等<sup>[6][23-25]</sup>对图1作了说明:张大昌曾据其所回忆,绘制了三皇图,但笔者已忘记其形,画稿也已早佚。所能记忆的只是一个人面蛇身图,应是伏羲或女娲,与此人格化之三皇像不同。根据此说,笔者选用王雪苔考证的张大昌草图摹绘图来展开论述。从图1中看出正中位为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其东南西北方位分别为四神: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东南和西南位为日、月;周围为二十八星宿。对于本书将此图置于卷首的含义,一些学者对其作出了解释。衣之镖等<sup>[6]</sup>认为三皇为医学创始人,卷首放此图意在追本溯源,高度概括了该书天人合一思想和学术渊源。田永衍<sup>[7]</sup>认为此图是为了说明本书为医学书籍,并且与道教有关,三皇在元代被命名为医祖,是伴随着元代建立三皇庙制度而出现的产物。北京大学考古中心杭侃认为将三者合祭,并在全国范围内将三者奉为医学祖神,抬高到国家大祭的地位,则是元朝一朝才有的特殊现象<sup>[8]</sup>。对于以上三家解释,衣之镖等只是分别对三皇、四象、二十八星宿、日月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总结性地说明,但对此图的深意并未阐释。田永衍认为此图三皇并称是元代的产物,然而王冰在补注《素问》序中开篇即言:“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sup>[9][11]</sup>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建立了以《三皇文》为核心的三皇信仰<sup>[10]</sup>,说明三皇并称早已有之,而不是到元代才出现,因此将此图考证为元代的产物也并不合理。杭侃将此图与政治手段联系起来,这种“特殊现象”只是跟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元世祖政权初定,实施三皇庙制度<sup>[11-12]</sup>,将三者合祭,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三者合祭表示认可三皇文化,仍然

施行已有的文化信仰不变,起到弱化民族斗争的目的;二是太医院地位较高,三者称为医祖,便于稳固统治地位<sup>[13]</sup>。因此三皇的载体形态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在不同的时期留下不同的历史的烙印,医祖的称谓也只是伴随政治手段而出现的产物,其文献载体的时代特征也就不能代表学术思想的形成时间,通过“三皇-三皇庙-元代”这样的载体模式认为《辅行诀》是元代以后著作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由此看出,此图对《辅行诀》成书的具体意义何在,诸多学者并未做较为深入的阐释。要阐释此图对《辅行诀》的重要影响,还当从三皇所在时代的文化说起。



图1 依张大昌草图摹绘之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sup>[3]</sup>



图2 王子旭提供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sup>[4][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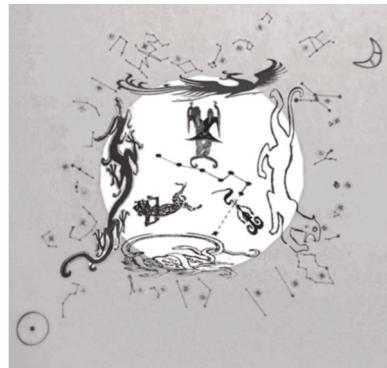


图3 陈志欣提供人面蛇身四神二十八星宿图<sup>[5]</sup>

## 2 伏羲时代标志——四象、先天八卦、二十八星宿

2.1 伏羲文化的渊源 谈起伏羲文化,必然会讲到先天八卦。《汉书·五行志》中刘歆言:“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

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sup>[14]</sup>这揭示了伏羲创立八卦是受到了河图洛书的启发。《易经·系辞传》又言：“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sup>[15]</sup>因此伏羲文化必然要从太极图说起，太极图展现出了阴阳两种象态盈虚损益的变化过程，此图通过描述一年中昼夜长短的变化，绘制出太极阴阳图，即“太极生两仪”，再将阴阳分出变化比较明显的两个象态，即“两仪生四象”。

四象分别为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而四象又是古人通过观察二十八星宿在赤道的分布规律绘制而成的，国家天文台赵永恒等<sup>[16]</sup>研究在公元前5670年左右，二十八星宿大致沿赤道均匀分布，当时人们倾向于用星宿以确定四季，这个时期正好是伏羲时代。在濮阳西水坡出土的龙虎蚌墓距今已6500多年，其墓葬中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和人骨的位置，其左龙右虎的图案与四象中的左青龙、右白虎相符合<sup>[17]</sup>，说明当时已有四象文化的雏形。

**2.2 伏羲文化在敦煌壁画中的展现** 伏羲文化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敦煌莫高窟中较早的如西魏大统四年（538年）、大统五年（539年）间绘制的第285窟的伏羲女娲图<sup>[18]</sup>（见图4），图中伏羲女娲左右对峙，人首蛇身，左侧为伏羲，手中持矩，身上有圆轮，内有金乌，象征太阳；右侧为女娲，手中持规，身上圆轮内有蟾蜍，象征月亮。寓意伏羲、女娲为开天辟地之神。至盛唐时期，伏羲文化广为流传，从新疆吐鲁番出土墓像中的伏羲女娲图可以印证，其图有二三十幅之多，多印在绢布中<sup>[19]</sup>（见图5）。图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手中各持规矩，上有日、下有月，四周为二十八星宿。由此可知南北朝晚期至唐代伏羲文化较为盛行，并提供了伏羲文化西传的证据。



图4 敦煌莫高窟伏羲女娲图<sup>[18]</sup>



图5 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sup>[19]</sup>

**2.3 伏羲文化对《辅行诀》的影响** 《辅行诀》中大小四神、二旦汤的创立即是对伏羲文化最直接的体现和运用，《辅行诀》载：“弘景曰：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以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以麻黄为主；白虎者，收

重之方，以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以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以附子为主。”<sup>[16][23]</sup>青龙位居东方，东方生风，象征春天万物复苏，气机向上向外的升发之象，以麻黄为主药的宣发之方大小青龙汤，二方基于“太阳为开”的理论打开并升起阳气，可治疗风寒束表之证<sup>[20]</sup>；白虎位居西方，西方生燥，象征秋天收杀之象，气机向下向内收敛，以石膏为主药的小白虎汤以润燥泻火、收重降逆为主；朱鸟位居南方，南方生热，象征夏天火热之象，气机亦向外发散，以鸡子黄为主药的大小朱鸟汤以清热泻火滋阴为主；玄武位居北方，北方生寒，象征冬天的寒冷凝肃之象，以附子为主药的大小玄武汤以行气温阳为主。旦者，日也。《说文解字》载：“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sup>[21]</sup>其意为太阳刚刚升起为旦。但文中为何又有阳旦、阴旦之分呢？由上可知青龙位居东方正位，即是太阳初升“旦”之所在的位置，而阳旦则位居东北方，从正北冬至转化而来初生一阳之气尚带有几分寒意，因此以黄芪、桂枝为主药的大小阳旦汤以升阳益气；而阴旦则位居东南方，此时阳气旺盛壮大，已带有南方盛阳的几分热意，因此以柴胡、黄芩为主药的大小阴旦汤以泄热升阳。伏羲称为“青帝”，强调东方上升之阳气，此二旦汤也充分体现了顾护东方初生阳气的思想。如后世李东垣在解释“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时说：“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sup>[22]</sup>即是此意。马继兴在《辑校》中又考证补充了大小勾陈汤和大小腾蛇汤，合其为六神汤<sup>[11][92-193]</sup>，此二神汤当是取“河图”之“五”数居于中央，五在脏应脾，体现了脾旺四季的制方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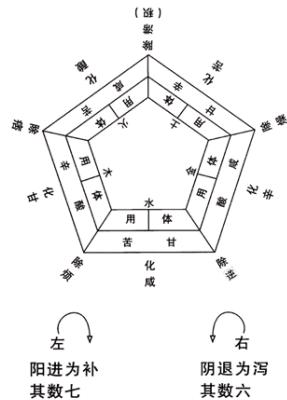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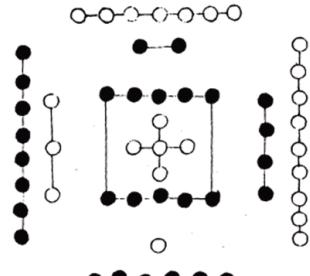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南北朝晚期至唐朝伏羲文化较为盛行，在西域也流传甚广，在此时期形成的敦煌壁画和吐鲁番出土墓像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辅行诀》也受此影响，将伏羲文化思想直接运用到了医学体系当中，《辅行诀》卷首图既是这一时代文化的产物。

### 3 神农时代标志——后天八卦开阖枢

**3.1 神农文化的渊源** 先天八卦乾卦在上为天，坤卦在下为地，而后天八卦乾卦在西北，坤卦在西南。从濮阳西水坡遗址可知，墓葬中陪葬儿童是按后天八卦方位放置，后天八卦当晚于伏羲时代，早于黄帝时代，当是神农时代的文化产物<sup>[23]</sup>。开阖枢思想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其证据有二：其一为三星堆遗址中的大眼睛鸟铜器像，突出了眼睛<sup>[24]</sup>，“离为目”，先天八卦中离卦在正东，后天八卦中离卦在正南，离卦由正东转为正南，这种转变的过程正是体现了阴阳开阖运动的动态思想，将“河图”变为“洛书”，“洛书”是太极图的动态表达<sup>[25]</sup>。“洛书”南方其数为九，代表阳之极，其色为赤，因此将神农称为“炎帝”。其二为《素问·气厥论篇》中脏腑移寒热规律正是先后天八卦变动的体现，如“肾移寒热于脾”，正是坤卦（脾）从正北移至西南，而后天八卦中正北为坎（肾）、西南为坤（脾）<sup>[26-27]</sup>，正是此意。

**3.2 神农文化对《辅行诀》的影响** 神农文化对《辅行诀》的影响体现在3个方面，论述如下：首先从《辅行诀》中“五脏体用化补泻图”<sup>[28][34]</sup>（见图6）中看出“阳进为补，其数七；阴退为泻，其数六”，其后又言“火数也；水数也”，要理解此图中“七”

和“六”的含义,还当从“河图”<sup>[29]</sup>(见图7)中“七”和“六”的方位属性来阐释。从图4可以看出,“七”在正南,其卦为离卦,因此将“七”称为“火数”;“六”在正北,其卦为坎卦,因此将“六”称为“水数”。所言“进”“退”者,当是圣人面南而命其位也,正北子时一阳初生,因此顺应阳气生长方向则“阳进为补”;正午午时一阴初生,阳气始降,逆着阳气生长方向则“阴退为泻”。总体来说,此图是表达阳气生长化收藏的盈虚损益关系。

图6 五脏体用化补泻图<sup>[28][34]</sup>图7 河图<sup>[29]</sup>

其次是图中具体的五味体用化配属关系,完全是运用《神农本草经》中所列药物的性味、归经来制方。如《辅行诀》载:“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sup>[28][33-135]</sup>“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sup>[28][33-135]</sup>《神农本草经》收录药物365味,《汤液经法》收载方剂365首,皆以应周天365度,《汤液经法》的主要内容是五脏虚实病症的补泻方剂,《辅行诀》中摘录了大小补泻方剂24首,运用五脏苦欲补泻的理论,依据五脏不同的体用特性,选取相应的药物来调整该脏的太过或不及之气,燮理阴阳,恢复该脏的体用化功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sup>[30]</sup>。张怡婧、柴毅等将其总结为“体虚为实,用虚为虚”的五脏虚实辨证法则<sup>[31-32]</sup>,并用公式来阐释组方理论,如:小补汤方=补方君药+补方佐君之臣+补方监君之臣+补方佐使,小泻汤方=泻方君药+泻方佐君之臣+泻方监君之臣,大补泻汤则是本脏小补泻汤加入子脏小补泻汤的部分药物构成的<sup>[33]</sup>。马骏等<sup>[34]</sup>将这种组方规律做成了大小补泻汤组方盘;高玉培等<sup>[35]</sup>将其做成了图数据库的知识图谱,使药物与体用化的五行性味对应关系更加清晰明了。由此可知,五脏体用不同,五味性味各异,通过五脏各自的体用特性选取相应药物,两相组合构成此图,书中所列方剂皆源于此,此图应当是陶弘景制方的核心所在。

最后从《辅行诀》的方药来看,书中所载的60多首方剂中涉及中药64种<sup>[36]</sup>,其药物多来自于《神农本草经》。由于《辅行诀》中并未记载较为全面的药物性味功效,笔者依据衣之镖对五脏补泻草木用药的分类<sup>[37]</sup>,选取《辅行诀》中大小补泻汤所涉及的部分药物,梳理这些药物在《神农本草经》<sup>[38]</sup>、《名医别录》<sup>[39]</sup>、《本草经集注》<sup>[40]</sup>中性味的记载。(见表1)

表1 《辅行诀》五脏补泻草木用药分类

| 分类  | 药物  | 《神农本草经》 | 《名医别录》 | 《本草经集注》    |
|-----|-----|---------|--------|------------|
| 肝木门 | 桂   | 辛,温     | 甘、辛,大热 | 辛,温        |
|     | 干姜  | 辛,温     | 大热     | 辛,温、大热     |
|     | 附子  | 辛,温     | 甘,大热   | 辛,甘,温、大热   |
|     | 细辛  | 辛,温     | -      | 辛,温        |
|     | 通草  | 辛,平     | 甘      | 辛,甘,平      |
| 心火门 | 牡丹皮 | 辛,寒     | 苦,微寒   | 辛、苦,寒、微寒   |
|     | 葶苈子 | 辛,寒     | 大寒     | 辛、苦,寒、大寒   |
|     | 大黄  | 苦,寒     | 大寒     | 苦,寒、大寒     |
|     | 旋覆花 | 咸,温     | 甘,微温   | 咸、甘,温、微温   |
|     | 泽泻  | 甘,寒     | 咸      | 甘,咸,寒      |
| 脾土门 | 半夏  | 辛,平     | 生微寒,熟温 | 辛,平、生微寒、熟温 |
|     | 甘草  | 甘,平     | -      | 甘,平        |
|     | 大枣  | 甘,平     | -      | 甘,平        |
|     | 人参  | 甘,微寒    | 微温     | 甘,微寒、微温    |
|     | 薯蓣  | 甘,温     | 平      | 甘,温,平      |
| 肺金门 | 茯苓  | 甘,平     | -      | 甘,平        |
|     | 升麻  | 甘,辛     | 苦,微寒   | 甘、苦,平、微寒   |
|     | 桔梗  | 苦,寒     | -      | 苦,寒        |
|     | 枳实  | 苦,寒     | 酸,微寒   | 苦、酸,寒、微寒   |
|     | 芍药  | 苦,平     | 酸,微寒   | 苦、酸,平、微寒   |
| 肾水门 | 麦门冬 | 甘,平     | 微寒     | 甘,平、微寒     |
|     | 山茱萸 | 酸,平     | 微温     | 酸,平、微温     |
|     | 五味子 | 酸,温     | -      | 酸,温        |
|     | 地黄  | 甘,寒     | 大寒     | 甘、苦,寒      |
|     | 黄连  | 苦,寒     | 微寒     | 苦,寒、微寒     |

从表中可以看出,《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药物性味的描述略有出入,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则完全吸纳了二书的记载,因此《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性味描述是《辅行诀》制方的理论基础。

#### 4 黄帝时代标志——十二律、调历、五运六气

4.1 候气术与十二律 “候气术”顾名思义是一种测定节气的方法。古人的思维模式是客观、直觉、发散式的,候气术测定节气所依赖的不是太阳的运行,而是地下“气”的变化。“候气术”是黄帝时期观察天象、物候重要的方法,是黄帝文化的

体现,从隋入唐后,“候气实验”开始离开历史的舞台,唐代律历一体思想开始衰落,整个唐、宋、元时期,在官方的天文机构中几乎见不到候气实验的记载<sup>[41][46-50]</sup>。早期的候气实验是通过观察从地下涌出的“气”穿过律管推动葭灰为基础而设计的,实验要求非常严格,如三重墙的候气室、金门山的律管、河内的葭草等<sup>[41][8-9]</sup>。通过候气实验测定十二中气的交节时刻而发现了亘古不变的十二律,由此以确定了十二月、十二地支。十二律的气虽从地下候得,但这种气象变化却是从天象变化而来的。《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载:“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sup>[19][29]</sup>可以看出十二律是由天之六气的开阖运动而来的。天之六气体现在物候现象上又可表现出“生、长、化、收、藏”的5种象态,用木、火、土、金、水5种代表性符号来表示,即产生了五行。五行的时间周期通过观察星象来定时,《史记·历书》言:“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sup>[42]</sup>故而产生了十天干。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两两相配,则产生了六十年为一周期的黄帝历,今之“老黄历”即是由此而来。因此五运六气则是黄帝时代的文化产物。

**4.2 黄帝文化对《辅行诀》的影响** 《黄帝内经》是黄帝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此时期医学思想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五运六气即是其中代表性的学术思想之一。从《辅行诀》书名、所引内容、编写体例等方面来看,其是对《黄帝内经》五运六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说明此时期五运六气思想较为盛行,为众多医家所关注。黄帝文化对《辅行诀》的影响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从《辅行诀》的书名来看,其全称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或《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两种称呼中只有“脏腑”和“五脏”二字不同,马继兴在《考释》和《辑校》中称“脏腑”二字,之后张大昌和钱超尘合著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称为“五脏”,但在其书收集的21个版本<sup>[47-56]</sup>中有称“脏腑”者,如范志良抄本、衣之镖抄本、王子旭抄本等,有称“五脏”者,如张大昌抄本、张握南别集本、赵俊欣抄本等,有两者称谓同时出现者,如刘德兴抄本。二名之称孰是孰非似乎没有定论,是否传抄有误也不得而知。之后诸多学者对此互称,两种叫法基本没有差别。但哪一种称谓更为合适呢?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sup>[43]</sup>来看,二书为何只称“十一脉”,书中所言经脉可知涉及“脏”的经脉有5条,即“五脏”,涉及“腑”的经脉有6条,即“六腑”。“五”和“六”是五运六气思想的体现,五、六合而为十一,书名所言“十一脉”者,不仅是全书内容的总结,更是核心思想的呈现。而《辅行诀》与《十一脉灸经》的书名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认为此书当称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更为贴切,从全书的主体思想和编写体例来看,也更加符合作者的原意。

其次从《辅行诀》主体部分所引内容来看,其五脏大小补泻汤的条文多出自《素问·脏气法时论篇》《灵枢·本神》《灵枢·五邪》3篇。如《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言:“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sup>[48]</sup>其与《辅行诀·辨肝脏病证文方》相同,《辅行诀》其它脏腑病证条文的篇章与此皆同。可以看出《辅行诀》和《黄帝内经》所谈理法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最后从编写体例来看,《辅行诀》则是直接继承了《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思想,文中五脏病证条文皆是先总说某脏病的具体症状,其次为治法,再分列大小补泻汤四首,最后为方剂组成和煎服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在分列汤剂时皆是先有某某方名,然后才是所治病证,难道这种编排体例只是体现“方证对应”吗?笔者认为作者之所以突出方的重要性,其意是在强调五脏的太过与不及,而五脏即是五行(五运)的体现,诸方皆为治疗五运太过、不及而设。但纵观全书,只看到五行,不言六气,又何以说是五运六气思想的体现呢?况且如果说《伤寒论》是通过《黄帝内经》“六气”和“标本中气”理论来制方<sup>[44-45]</sup>,是否可以说《辅行诀》是继《伤寒论》之后对《内经》运气理论中五运思想的补充呢?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且看陶弘景在文后又有小养生补肝汤、小调神补心汤、小建中补脾汤、小凝息补肺汤、小固元补肾汤等5首方,是为治疗五运平气之年而设。五运六气理论虽然有五运和六气之分,六气言在天之气象变化,五运言在地之物候现象,但运气加临的结果最终还是要落到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上来,其结果不外乎3种:太过、不及、平气。而五行生克制化的关系则从五味互含理论得以体现,陶氏遣方用药的思路也是源于此说。整体来看,《辅行诀》不仅是对《黄帝内经》五运六气思想的继承,而且是对《伤寒论》“六气”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 5 小 结

对于出土文献的解读,既要探究字中深意,也要读懂无字之图。《辅行诀》卷首图包含日月、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等信息,书中内容也是围绕三皇文化所蕴含的医学思想而展开论述的,《辅行诀》中大小四神、二旦汤的创立是运用了伏羲时代四象、先天八卦、二十八星宿文化,以麻黄为主药的大小青龙汤,以石膏为主药的大小白虎汤,以鸡子黄为主药的大小朱鸟汤,以附子为主药的大小玄武汤,以黄芪、桂枝为主药的大小阳旦汤,以柴胡、黄芩为主药的大小阴旦汤等是其文化的直接体现。书中“五脏体用化补泻图”、五味体用化配属关系揭示了阳气生长化收藏的盈虚损益关系,方中所用药物及性味功效与《神农本草经》中的记载基本相同,是神农文化的体现。书中的汤剂条文多取自《黄帝内经》原文,书名、编写体例继承了《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思想,是黄帝文化的体现。《辅行诀》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化传承与理论创新,更是架起了古代哲学、数术与中医临床之间的桥梁,其动态的五行互含用药模式、数术化的组方模型为经方的运用提供了难以替代的范本,解读卷首图的文化内涵是揭示本书学术思想的关键所在,也为研究经方的学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 参考文献

- [1] 马继兴,王淑民,陶广正,等.敦煌医药文献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2] 王淑民.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考[J].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25(3):36-39.
- [3] 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203.
- [4] 陶弘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M].张大昌,钱超尘,

- 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 [5] 陈志欣,陈东英.《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解读[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3:1.
- [6] 衣之镖,赵怀舟,衣玉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讲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 [7] 田永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非藏经洞遗书考:从文本形式与文献关系考察[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4):232-237.
- [8] 杭侃,彭明浩.三皇庙铜祭器及其相关问题[J].古代文明(辑刊),2010,8:267-284.
- [9] 黄帝内经素问[M].田代华,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10] 李璐.魏晋南北朝道教的三皇信仰[J].世界宗教文化,2024(4):135-142.
- [11] 赵彬,宋晓云.元代三皇信仰考述:以三皇庙为考察中心[J].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24(1):341-353.
- [12] 陈俊达,陈鹏.炎黄文化与中华意识:以辽夏金元时期为中心[J].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4,30(1):139-153.
- [13] 刚什辉.元代西辽河流域民族融合问题研究[D].通辽:内蒙古民族大学,2024.
- [14] 范晔.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一册)[M].许嘉璐,编.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591.
- [15] 四书五经:第二册[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3:444.
- [16] 赵永恒,李勇.二十八宿的形成与演变[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30(1):110-119.
- [17] 朱乃诚.中国龙起源的考古学再探索[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4(4):94-98,127.
- [18]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敦煌壁画全集(西魏)[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155.
- [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新疆文物古迹大观[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143.
- [20] 史光伟,王凯莉,郭宏明,等.基于“太阳为开”图解大、小青龙汤[J].中医药导报,2018,24(16):17-19.
- [21] 《新编说文解字大全集》编委会.说文解字[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55.
- [22] 张年顺.李东垣医学全书[M].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33.
- [23] 顾植山.五运六气与炎黄文明[N].中国中医药报,2017-07-26(8).
- [24] 吴宛妮.波曲纹填充纹样考:兼谈三星堆连山纹与商周神鸟崇拜的视觉表现[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4(3):41-55.
- [25] 陈瑞祥.先天八卦图与河图洛书及后天八卦图的关系[J].中医杂志,2024,65(24):2519-2526.
- [26] 顾植山.《素问·气厥论》中脏腑寒热相移次序解读[J].中医文献杂志,2002,20(4):34-35.
- [27] 周姝,范海燕,连方.从后天八卦与六气探讨《伤寒论》四象之朱雀汤[J].中医药通报,2024,23(9):26-28.
- [28] 李应存.实用敦煌医学[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 [29] 江永.《河洛精蕴》白话全解[M].刘鸿玉,译解.北京:气象出版社,2019:5.
- [30] 黄羚,高莹,梁硕,等.《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主于补泻者为君”组方特点辨析[J].天津中医药,2025,42(1):66-70.
- [31] 张怡婧,黄智斌,陈延.论《辅行诀》用虚体实辩证治疗模式[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1,27(12):1864-1867,1900.
- [32] 柴毅,谭峰,樊巧玲.《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五脏之体用辨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7):3409-3412.
- [33] 柴毅,季旭明,黄宏.《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补泻汤组方结构分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5,40(2):829-831.
- [34] 马骏,杨晓轶,李应存,等.敦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组方规则与转化应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4):1922-1925.
- [35] 高玉培,张林,朱文涛,等.基于图数据库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知识图谱构建研究[J].中国数字医学,2023,18(12):92-98.
- [36] 姚蕙莹.《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五脏辨治规律研究[D].兰州:甘肃中医药大学,2021:6.
- [37] 衣之镖.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药性探真[M].北京:学院出版社,2015:1-2.
- [38] 神农本草经[M].吴普,述.孙星衍,孙冯翼,辑.曹瑛,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 [39] 陶弘景.名医别录:辑校本[M].尚志钧,辑校.尚元胜,尚元藕,黄自冲,整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 [40]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辑校本[M].尚志钧,辑校.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 [41] 王玉民.候气术古人观念中天地人之纽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 [42] 司马迁.史记[M].陈曦,周旻,注.陈曦,王珏,王晓东,等,译.韩兆琦,审阅.北京:中华书局,2022.
- [43] 顾植山.让中医五运六气学说重放光芒[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30(2):137-142.
- [44] 杨茹芸.以标本中气与开阖枢理论探讨《伤寒论》六经辨治规律[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17.
- [45] 李天鹏.从标本中气理论探讨《伤寒论》寒热错杂证证候机理[D].兰州:甘肃中医药大学,2018.

(收稿日期:2025-03-10 编辑:刘国华)